

驻美新使馆由贝聿铭亲自设计

2

纪实文学

从“五月花”到“温莎”

在华盛顿，有两座老建筑见证了中美关系30年的发展历程。一座是五月花旅馆，另一座是温莎旅馆。

1973年4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破冰之旅”的第二年，中美在对方首都设立联络处。作为过渡性安排，联络处是两国关系正常化之前，中美在对方首都开设的没有大使馆名义的代表机构，实际上代行大使馆功能。中国驻美国联络处的第一任主任是资深外交家黄镇，周恩来总理特批900万美元让黄镇购买联络处房产。几经挑选，黄镇选定了温莎旅馆，还另外买了两处官邸。中国驻美国联络处最早是将工作场所设于华盛顿康涅狄格大街使馆区边缘靠近公寓住宅区的一家旅馆——五月花旅馆。路透社在当年发自华盛顿的报道中这样写道：“中国国旗将自1950年以来头一次在这里飘扬。人们认为建立联络处的这一行动除了名义以外，完全是外交上的承认。”这座颇有名气的旅馆一直是美国总统就职舞会的场地之一。罗斯福曾在此起草了总统就职演讲稿；杜鲁门也曾在此寄居了90天。

同年12月，中国驻美国联络处从五月花旅馆搬入不远处的康涅狄格大街2300号温莎旅馆。康街是华府的一条南北向的主干道，温莎旅馆位于该街的中段。

1978年12月，我任中国驻美联络处随员，两年后提升为三秘，正是在这里我开始了驻外生涯；我的另三次使美履历中的两段——驻美公使和驻美大使，也在这里完成。对这个由旅馆改造的联络处，我当时的印象是：房屋老旧，内部陈设简陋，旅馆留下的旧家具随处可见，床垫已失去弹性，躺下去身体一下陷得

很深。这座有着400多个房间的八层大楼建于高地，大门外有个街心花园，从这里向北望去可以看到远处的华盛顿国家大教堂。大楼临街，康街在这里穿过一座旱桥通向华盛顿的西北郊外。

这座建筑，成为见证中美关系35年历史的第一现场。邓小平同志访美时曾在这里举行过答谢招待会。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1979年3月1日，中国驻美国联络处升格为大使馆。

中美建交之初的十年，中美关系总体上处于“蜜月”期。驻美使馆这幢八层大楼，虽说其功能不符合大使馆的要求，与附近的韩国和日本驻美使馆相比，无论在规模和陈设上都逊色不少。但就那一时期中美关系的业务量来说，这座建筑的空间还算宽敞，近百名驻美人员生活、工作在一楼内也很方便。当时，参赞的住房能达到40平方米左右，其中客厅20平方米，卧室约十多平方米；参赞以下人员每人一间，大小不等，人均也就十多平方米。宴会厅也够大，每逢春节国庆，可举行数百人的招待会。

空间困扰

我担任驻美大使前的18年里，另有三次常驻美国的经历：1987年至1990年任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副领事；1994年至1995年任驻洛杉矶总领事；1995年至1998年任驻美国使馆公使。其中任公使的三年，我再次工作和生活在美国的中国驻美国大使馆。

与我首次常驻华盛顿相比，再次常驻这里的一个深刻印象是，驻美使馆不仅仅在建筑功能上存在着无法克服的“先天”缺陷，而且在空间上也显得日渐狭窄了。随着工作

范围不断扩大，驻美使馆增设了国会处、双边处、调研处等多个处室，外交人员也从过去的不满百人增加到近200人。尽管文化处、武官处、商务处、教育处等先后搬出使馆，另辟办公及居住的地方，但使馆建筑空间仍是捉襟见肘，办公条件拥挤局促，对外接待条件更为有限，接待来客需登记会客室；大型招待会因场地所限，经常拥挤不堪。由于建筑物和家具陈旧，难免存在诸多卫生死角，使馆经常全体动员灭蟑灭鼠。

比起楼内的拥挤，楼外的空间也十分有限。停车场狭小，车辆进出须提前挪动其他车才能腾出行驶通道，中国外交官的车辆只能停在馆外或路边，常被当地警察拖走或贴罚单。由于华盛顿地区各种政治势力鱼龙混杂，大使馆常受到一些不安定因素滋扰。肩负着中美关系重大使命的这座红砖建筑在周围的建筑包围下显得不合时宜。

鉴于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已不适应中美关系发展的需要，记得我任公使期间，外交部有关职能部门曾提出对使馆建筑进行改造的想法，方案是外表不动，内部彻底改造。当时没提出建新馆，因为各国使馆云集的华盛顿，其地价极为昂贵，建设一座现代化的新馆非当时中国国力所能及。李道豫大使则主张建新馆。他指出，从百年大计考虑，建设新馆尽管尚待时日，却势在必行。

此时，伴随中国外交事业的迅速发展，驻外使馆的改革也加快了速度。其中的一项重要改革是对驻外使领馆工作人员的工资制度进行改革。改革后的驻外使领馆减少了工勤人员，使馆人员增加了收入，配偶可以随任，住宿逐步迁到馆外的公寓。

随着我国国力日益强大和对外

开放不断扩大，驻外使领馆的馆舍建设提到了国家的议事日程上。1999年初，中美双方开始就为在对方首都建新馆提供土地问题进行谈判，之后双方又就施工条件协议进行了谈判，直到2003年，漫长的谈判有了眉目，当年11月双方在北京签署了有关协议。其最主要推动力源于美方在北京的大使馆也遇到了与我们相同的空间困扰。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在中国有雇员上千人，因房子不够用而将各个部门拆分在北京十余个处所办公。

由于双方都急需建设新馆舍，谈判虽几度搁浅，但总能适时转圜，互惠成为打开双方僵局的最好钥匙。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以及根据双方在对方首都的大使馆所占地皮总面积应相等的原则，中方给予美方亮马桥附近4万平方米的土地建设新馆，从此他们将告别分散办公而可以将所有的机构合到同一地点；美方将华盛顿1万多平方米土地划给了中方建设新馆，老馆馆舍依然保留，已经搬出的教育、商务、文化、武官处等原地不动。

确定建设新馆设计后，首先要确定的是新使馆的设计方案。

设计师由谁担当？经过遴选，新使馆的设计师最终确定为当时已退休、89岁的著名华裔建筑大师贝聿铭先生，其儿子的美国贝氏建筑事务所参与具体工作。

贝聿铭先生为新使馆工程全力以赴，从构思草图至细部构造、材料选择、艺术品匹配，无不亲为。他的两个儿子贝建中和贝礼中几乎插不上手。贝老认为，这个建筑要庄重、有力量、展现中国正在崛起的大国地位。建筑整体仍遵循中国传统的庭院布局，但外形上采用现代的更加国际化的方式。

最有气节的文天祥也没能挽救南宋

完

品读历史

南北两宋，在英雄人物中，最有名气的应该说是岳飞。而最有气节的，显然应该非文天祥莫属。如果说，宋朝的武将，十之八九，其结局都很悲惨，而文天祥的结局则无疑应该说是悲壮。

文天祥出生在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一个书香门第，那是公元1236年，也即南宋理宗端平三年。当时，北方的蒙古军队已在两年前一举灭掉了金国。就在南宋小朝廷为自己的“联盟灭金”战略所取得的历史性的胜利大为得意、欢呼、庆祝的时候，没想到的是，灭金还不到一年，刚刚还是“盟友”的蒙古小老弟忽然对自己动起手来。

当蒙古军队的铁蹄分三路在四川、襄汉、江淮等纵横几千里的战线上朝南宋杀来，令人想不通的是，大敌当前，刚刚趁奸相史弥远刚死收回权柄实行“亲政”的宋理宗竟然不去组织动员抗战，反而在这种时候搞什么“端平更化”，发扬光大朱熹的道学理论，在尊崇道学的同时，又大批特批王安石，花了将近30年的时间高喊“正心诚意，克己复礼”，大搞思想运动。结果，在大敌当前、国家危在旦夕的情势下，竟然白白失掉了许多救国良机。

所以，文天祥一出生，就别无选择地处在南宋政府极度腐败、内忧外患空前严重的重大历史关口。文天祥的父亲文仪以读书勤敏、学识渊博闻名乡里，但却不喜欢做官，只愿在家乡以教书为乐。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下，他不仅学会了怎样读书，而且学会了怎样做人。

据《宋史·文天祥传》记载，文天祥长得“体貌丰伟，美皙如玉，秀眉而长目，顾盼烨然”，是个美男子。20岁那年，到临安参加进士考试，对策集英殿，以“法天不息”为题，洋洋万言，一挥而就。在这篇

《御试策》中，文天祥切陈时弊，毫无顾忌，上自皇帝，下自污吏贪官，无不在指斥之列。自然，文天祥绝对不会“骂”了之，在痛斥一番时弊之后，他笔锋一转，殷切希望理宗能够彻底改变因在位日久而理政浸怠的现状，“法天不息”，励精图治。

因为主考官王应麟的极力推荐，文天祥有幸被宋理宗钦点为第一，成为御题状元。文天祥原字履善，据说，由于宋理宗在钦点其为状元时，叹其佳佳，欣然道：“天之祥，乃宋之瑞也”，故而文天祥又字宋瑞。可极具悲剧意味的是，无论对于文天祥本人，还是南宋帝国，其结果都是既不“天祥”，也不“宋瑞”。

那年，蒙古大汗蒙哥率军侵入四川，忽必烈领兵直逼鄂州，南宋局势更加恶化。一时间京师汹汹，人心惶惶，朝廷震恐。这种时候，理宗的贴身内侍、宦官董宋臣主张迁都逃跑，对此，才刚进入仕途的文天祥愤然上书，指出迁都的办法是小人误国误民的错误建议。同时他还建议改革朝政、扩充军队、连接州县、联合抗敌的应急措施，可是，朝廷根本不予理睬。血气方刚的文天祥不满朝廷的黑暗与懦弱，便弃官回乡。

由此可见，如果不是生于乱世，而在太平年间，像文天祥这样疾恶如仇的人，几乎很难在尔虞我诈的封建官场存身立足。所以，后来文天祥能一路青云直上，实在不是他有什么升官秘诀，而完全是由于时势使然。否则，这种升官发财的好事即便挤破头也断然轮不到他。

平心而论，文天祥不是军事家。这位宋理宗宝祐四年的状元，其实只是个文科状元，不过是一介文弱的书生。可是，时代却阴差阳错地把他推到了武将的行列。这，不仅是文天祥个人的悲剧，显然更是南宋整个国家的悲剧。

投笔从戎，文天祥的第一次“登场”应该是在宋恭帝德佑元年。这年的正月，因元军大举进攻，宋军的长江防线全线崩溃。大难来临，皇太后谢道清下《哀痛诏》让各地组织兵马勤王。眼看国将不国，稍微精明点的官员都在打着自己的小算盘，想着自己的后路，谁还把皇太后的诏书太当回事？所以，诏书下了很多天，临近京城的地方官员都按兵不动，不作回应。

此时，文天祥正在江西赣州任知府。只要他稍微精明点，这时候缩着脖子，一声不吭，绝对不会有他什么事。可是，说来历史朝代都是“小人精明君子傻”，接到勤王诏书后，只有文天祥“傻乎乎”的，第一个响应，不仅在江西迅速举起了勤王的义旗，组建了一支万余人的义军，开赴临安，而且还无偿捐献出祖辈留下的一点房产和田地充作军费。

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文天祥在几乎毫无铺垫、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完成了由一名文臣向一名武将的转变。可是，几次仗打下来，事实证明，秀才遇到兵，文天祥根本就不是元军的对手。说也难怪，文天祥本就不晓军事，文弱书生一个，而他遇到的对手又不幸正好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被欧洲人称之为“上帝之鞭”的蒙古军队，因而，文天祥的失败也就在所难免，毫不足怪。

德佑二年正月，元军占领了离临安仅30多里的皋亭山，逼迫南宋政府谈判。这时候，文天祥的“官运”来了，他先是早晨被任命为枢密使，到了中午，又被授予右丞相兼枢密使之职。在与元军主帅伯颜谈判时，文天祥大义凛然，毫不示弱。

这之后，文天祥受到了元人的“特别照顾”，与文天祥一起去元营的谈判代表都被遣返回宋，而他却被扣留了下来。直到几个月后，在被

押解北上的途中，一天夜间，趁看守元军疏于防备之时，他与一行12人成功逃脱，这应该说是文天祥的第一次被俘。而在这时候，南宋恭帝以及皇太后谢道清率百官降元已近一个月。南宋实际上已经灭亡了。

从元营逃脱后，虽然遭受了许多磨难，但文天祥却“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扬子江》），始终不屈不挠地坚持抗元斗争，直到两年后即景炎三年第二次被俘为止，这期间，他多次发动并领导了南宋遗民与元军展开了最后的殊死搏斗。

史载，在文天祥第二次被俘后，由于急需治国人才，元统治者包括忽必烈都想说服这位“南宋状元宰相”归降，能到新朝为官，于是便想方设法做文天祥的劝降工作。为了在元人面前立功表现，宋朝数位宰执级降臣，包括同为状元宰相的留梦炎，皆入狱中劝降。文天祥或讥、或讽、或骂，这些小人无不灰溜溜羞惭而去。

公元1283年1月9日，文天祥被押至元大都柴市刑场，从容就义。由于多年被囚禁于斗室，文天祥已经丧失方向感。当辨明方向后，他虔诚地跪下来，向着南方祭拜，礼毕，又索笔为诗一首：昔年单舸走淮扬，万死逃生辅宋皇。天地不容兴社稷，邦家无主失忠良。神归嵩岳风云变，气入烟岚草木荒。南望九原何处是，关河暗淡路茫茫。

写毕，他对执刀的刽子手说：“吾事毕矣”，伏首受刑。时年47岁。文天祥的死不仅感动了几乎在场的所有人，也感动了当时元最高统治者。据说，当获悉文天祥死后，忽必烈追悔莫及，很是惋惜：“文丞相好男子，不肯为吾用，一时轻信人言杀之，诚可惜！”即使多年后言及其事，还感叹说：“是好人也。”



周文重 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周文重，祖籍江苏，1945年出生于重庆，幼年随父母迁居上海。20世纪60年代毕业于北京对外贸易学院，1973-1975年在英国巴斯大学、伦敦经济学院进修。留英回国后供职于外交部，先后在翻译室、美大司工作；历任驻巴巴多斯、安提瓜和巴布达、澳大利亚、美国大使；曾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副部长。本书以白描的手法忠实记录了作者2005-2010年任中国驻美国大使期间亲身经历的十二件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美关系的历程。

[上期回顾]

2005年4月3日，周文重抵达华盛顿。5月26日下午，他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布什总统递交了国书。



丁守卫 著
中国铁道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读宋朝的历史，乍一看去，有很多事情，总是很容易让人“读不懂也想不通”。譬如说，宋朝是一个由武将通过军事政变的形式篡夺政权组成的国家，按理说，这样一个“军人政府”应该实行“军人专政”。然而，它的军事与国防却“不及其他任何主要的朝代”，它所实行的却是“文人专政”。尽管它是中国历史上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富裕的王朝，但这个国家却一直未能实现“富强”，而是极为异常地“富弱”……其中的许多人物与故事，在今天看来，也仍然非常生动。

[上期回顾]

从某种意义上说，和李纲一样，岳飞在骨子里是一位带有诗人情怀的军人，而他的悲剧也正源于此。